

论中国的思想文化对哲学的影响

王 路

摘要 伴随着改革开放,西方哲学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中西方哲学比较研究逐渐呈现出热度。近年来,中国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反思,对中国哲学研究中使用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方法、借鉴其研究方式提出批评,主张进行自主的具有独具特色的中国哲学研究。相比之下,人们较少思考我国西方哲学的研究是不是使用了中国哲学中的概念和方法、借鉴其研究方式并受其影响。无论是在术语的形成还是观念的导向上,中国的思想文化对我国西方哲学的研究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我国的哲学研究涵盖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以及众多哲学领域,其发展需要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互借鉴、相互融通和共同进步。正确地认识中国思想文化对我国哲学研究发展的影响,对于更好地认识哲学的实质,更好地发展我国哲学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中国哲学;中国的哲学;中西方哲学比较;中国思想文化;形而上学

中图分类号 B2;G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5)02-0044-12

“哲学”一词译自philosophy。philosophy是西方的东西,所以,哲学本来就是西方的东西。哲学引入中国,在中国得到发展,形成了中国的哲学(philosophy in China),即通常说的“我国哲学”。

在我国哲学研究的发展中,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东西,这就是中国哲学(Chinese Philosophy)。它与西方哲学相对应,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逻辑学等学科相并列。它们一起构成了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与中国的哲学是不同的,后者涵盖前者。通俗地说,我国哲学研究包含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8个二级学科和研究方向。本文的讨论只限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互区别,各具特色。人们承认,中国哲学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借鉴了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了西方哲学的用语和概念。一些研究表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认识到中国哲学的实质所在,认识到其与西方哲学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研究中谈论西学东渐,讨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包括批评中国哲学过度使用西方哲学的概念,给中国哲学研究带来了负面效应;人们也从中国哲学的性质和特征出发批评西方哲学的缺点,并提出哲学的发展前景。但是,人们在研究中很少谈及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的影响,好像中西方哲学之间的影响只是单向的:只是后者对前者有影响,而前者对后者没有什么影响。我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本文旨在说明,在我国哲学发展过程中,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也是有影响的。

应该看到,哲学来自西方。所谓西方哲学是人们为了与中国哲学相区别而采用的一种称谓。而所谓中国哲学,是在“哲学”前面加上“中国”二字,表示人们认识到中国的思想文化中有一些特殊的東西,比照着西方哲学将它们称为哲学。所以,“中国哲学”这个名字的产生包含着两种东西,一是观念性的东西,即哲学的观念,二是中国思想文化方面的东西。由此我们也可以在两种意义上理解西方哲学:一种是简单的,仅指哲学;另一种复杂一些,既有哲学的观念,也有西方思想文化方面的东西。具体到西方哲学在我国的研究,除了这两个方面,还会多出一些东西,这就是中国的思想文化的影响。在我看来,中国

的思想文化不仅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和发展产生影响,对我国西方哲学的研究和发展也产生影响。

本文围绕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研究提出:中国的思想文化对我国哲学的研究和发展不仅有影响,而且影响巨大。

一、用语的影响

哲学的引入直接与语言相关。最简单地讲,人们翻译一些西方哲学著作,知道并使更多人知道了有这样一种被称为“哲学”的东西。人们认识到它们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不同,努力使用自己的语言将这种东西表达出来,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依据这种语言来认识和阐述这种东西。这里涉及语言的转换和思想的呈现两方面的问题。事实是,在哲学引入的过程中,汉语翻译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应该看到,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哲学受到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结果是给思想的呈现带来一些问题,从而给人们哲学的理解造成了一些影响。下面我们以西方哲学的几个基本和常用概念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形而上学”一词是借用《易经》用语“形而上者谓之道”对 *metaphysics* 一词的翻译。后者由 *meta*(在……之后)和 *physics*(物理学)这两个词组合而成,字面上含有与物理学相区别的意思。众所周知,该英文并不是译自希腊文,而是希腊文的沿用。*Ton Meta Ta Physika* 是亚里士多德留下来的哲学著作的名字,也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假如认为古希腊的物理学意味着科学,则可以看出,这个希腊文以 *meta* 和 *physika* 组合而成,意味着与科学相区别。由此可见,这个词包含着关于学科的划分和区别。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西方语言中的这种与物理学相区别、进而与科学相区别的意义也许会被遗忘,甚至已被遗忘,但由于它字面上有这种意思,因而随时可以被认识,且只要稍加注意就会有所认识。

中文的“形而上学”,字面上消除了物理学的意思,消除了与物理学的区别,因而消除了学科意义上的区别。其中的“上”是比喻用法,给人以想象空间,但无论如何理解也不会有学科意义上的东西。这个词使用久了,似乎就只是意味着一种玄而虚的东西。

“本体论”一词译自 *ontology*。该词的词根是 *on*,是希腊文 *einai* 一词动词用法的分词形式,作名词使用。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关于哲学的说明是:有一门科学,它研究 *to on hei on*,使 *on* 一词成为哲学的核心概念。后人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相关研究称为 *ontology*,这就表明,该词是基于 *on* 而形成的抽象名词,意思是关于 *on* 的学说。该词的动词第三人称单数是 *esti*,典型用法是系词。在亚里士多德时代,“系词”尚未作为一个术语出现,但亚里士多德已经有了明确的关于系词用法的说明。比如,他在关于 *on* 的词典意义的说明中明确指出,它表示“*tode einai tode*”(“这是这”),而在关于该词用法的说明中指出,只有名词不行,要把 *einai*(是)和 *mei einai*(不是)加到名词上,才构成句子,才有真假。这说明,*on* 的用法是系词,至少其主要用法是系词,它是系词意义上的东西。无论系词表达的是什么,至少字面上与语言相关。这说明,*on* 是与语言相关的,是与关于表达认识的东西相关的。

中文中 *being(on)* 被译为“存在”,从而消除了其系词特征和含义。因循这一译法,中文将亚里士多德说的 *to on hei on* 译为“作为存在的存在”。姑且不论这种翻译的对错,与“本体论”相对应,这种译法消除了 *ontology* 一词与 *on* 的字面联系,因而消除了这两个词本来所带有的对应性;更差的是,“本体论”字面上消除了与系词的联系,凸显的则是其核心的“体”字。“体”的物化特征十分明显,很容易使人们以为,“本体论”是与物理世界及其事物相关的,而与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认识没有什么关系。特别是在与“认识论”相对应时,人们会以为,本体论是关于客体和客观世界的讨论,认识论是关于主体和主观世界的讨论。近年来也有人将“本体论”改译为“存在论”。表面上看,这种作法使 *on* 与 *ontology* 的翻译联系起来,但它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它的依据是将 *being* 译为“存在”。无论这种看法是不是有道理,由此而来的“存在论”这一改译是不是有道理,其结果依然仅仅显示出与外界的联系。不管怎样理解,*ontology* 字面上那种与语言的关系、由此形成的语言与世界以及语言与认识的关系,无不消失殆尽。

“共相”和“殊相”译自英文 *universal* 和 *particular*,“感性”和“知性”译自德文 *Sinnlichkeit* 和 *Verstand*。

这两对概念反映了中国语言表达的特点:它们采取了对仗方式。对仗是中文表达中一种修辞形式,为的是凸显对应性和漂亮。从字面上可以看出,外文这两对概念没有这样的对应形式,后一对德文的英译 *sensibility* 和 *understanding* 也没有这样的对应形式,因而这样的对仗方式在这样的翻译中不是必要的。问题在于,这样的翻译是不是呈现了原文所表达的思想。只要不影响对原文的理解就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即使有问题也不大。但是情况并非如此。

universal 和 *particular* 是古希腊哲学用语的翻译,意思是“普遍的”和“特殊的”,加定冠词作名词用时指普遍的东西和特殊的东西。特殊的东西意味着个体的东西。这一对概念十分重要,也是逻辑用语,是关于量的区分,后来还出现在康德的范畴表中。近代以后它们的使用发生了变化。人们谈论 *general* 和 *individual*,即一般和个体,作名词用时指一般的东西和个体的东西。到了现代,人们谈论 *concept* 和 *object*,即概念和对象,依然指这样对应的东西。“相”一词属于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传统用语,它的使用使这样的意思以及与后来相应概念的联系和延续性消失了,至少是极大的模糊了。

Verstand 是近代德国哲学用语,是动词 *verstehen* 的名词形式,意思是理解,也应该译为“理解”。康德的相关讨论提到了洛克的著作《人类理解论》,他使用的 *Verstand* 一词对应的也是洛克说的 *understanding* (理解),采用“知性”这一译语在很大程度上大概是为了修辞考虑的,即“感性”“知性”和“理性”(Vernunft)这三者的区别和排列以及在表述上的对应性,但德文字面上没有这样的对应性。此外,“理解”与“感觉”的区别是明确的,“理解”的意思也是明确的,这是一个自明的概念,也是一个日常使用的概念。我们可以认为,“知”含有理解的意思,但是“知性”并不明确表示“理解(性)”。且不论从洛克到康德关于同一个概念讨论的延续性,也不论该概念到现代哲学讨论的延续性,即使仅考虑康德,这样的翻译也使一个本来就明确的概念变得不是那样明确了。

以上例子说明,中国思想文化,包括用语和表达方式,对西方哲学用语的翻译产生了影响,译文反过来也会影响到人们对西方哲学的认识。

二、观念的影响

中国以前没有“哲学”这个名称。哲学引入中国之后,人们开始谈论哲学,开始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寻找相应的东西进行研究,使之学科化,并命名为“中国哲学”,形成了今天我国哲学中一部分独具特色的研究,也是世界哲学中一部分独具特色的研究。中国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受益于哲学观念的影响,反过来也影响着人们的哲学观念。在这一方面,冯友兰对哲学的认识大概可以算是最好的例子。

冯友兰早期认为,哲学是外来名称,讲中国哲学史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1](P1),所以,“西洋所谓哲学,与中国魏晋人所谓玄学,宋明人所谓道学,及清人所谓义理之学,其所研究之对象,颇可谓约略相当”^[1](P7);后来他认为,他“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2](P1)。到了晚年,冯友兰讨论“什么是哲学”,并且明确地说:“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3](P10)冯友兰的看法明显有一个变化:开始时他比照西方哲学概念和认识来谈论中国哲学,后来他自己定义哲学,于是可以按照自己的认识谈论中国哲学。所以,冯友兰晚年时与他早期关于哲学史的写作,尤其是在选材方面,区别极大。从字面上可以看出,“人类精神的反思”与人相关,由此出发就不必再考虑那些以西方哲学进行称谓的东西,不必考虑所谓宇宙论(物理学)、人生论(伦理学)和知识论(方法论)以及与它们的对应性。

与人相关,这种看法绝不是冯友兰个人的,而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张岱年认为,哲学是天人之学、衡鉴之学、有理的信念之学^[4](P62)。这一说明可以说包罗万象,但是“天人之学”之说乃是第一位的,因而人处于核心的位置。又比如牟宗三认为,“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4](P62)。这一说明更是将哲学与人的活动直接联系起来。与人相关,这大概是中国思想文化中比较核心的东西。无论是由此衍生出关于人类精神的反思,还是从对人性活动的反省到天人合

一的认识,总归是要与人有联系的。2018年在中国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主场优势使大会主题定为“学以成人”(learn to be human),似乎不只是显示出中国哲学家有了话语权,同时也使中国哲学的观念堂堂正正地登上世界哲学大会之堂。比较一下“学以成人”和“learn to be human”就会发现,英文是彻头彻尾的大白话,意思是“学做人”,既不是哲学概念和理念,也不会成为哲学概念和理念。中文似乎不是这样:有人认为这里有一个如何表达得文雅一些的问题,似乎表达文雅了就显得富有哲理,因而似乎就可以成为哲学概念。也就是说,即便英文 learn to be human 既不是也不像一个哲学表达,我们似乎也可以通过汉语翻译使它看上去像一个哲学表达,从而将它变为一个哲学表达。

中国哲学的讨论一直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一般来说,人们会将这一关系看作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最典型的莫过于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在我看来,“合法性”含有比喻的意思,其中的“法”可以看作尺度。这一讨论的意思是说,有一个尺度,看中国哲学是不是符合这个尺度。“中国”是自明的概念,不会有什么问题,问题似乎在于把它加在“哲学”上。也就是说,在考虑“中国哲学”是不是符合“哲学”的时候出了问题。由于哲学来自西方,因而就有了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以冯友兰为例。他最初和后来关于哲学的说明不同,因而选材范围也极大不同。他早期的说明借鉴西方哲学,认为《孙子兵法》不属于哲学史史料,因而不予以论述,他还认为《吕氏春秋》不属于哲学史的原始史料,只能作为辅助的史料。但是在晚期,他认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他就称《吕氏春秋》的作者和一些杂家为“第二流的哲学家”,认为“他们没有创造性,他们的体系也没有生命力”^[3](P805)。但是,再差的哲学家依然还是哲学家,无论如何,像《孙子兵法》这样的东西也一定不会与人类精神的反思没有关系。所以,尺度的不同导致的结果注定也是不同的^①。

从冯友兰的思想发展过程来看,他从西方哲学的观念出发,然后形成了自己的哲学的观念,最后依据自己的哲学的观念从事哲学研究。客观来看,冯友兰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需要建立起中国哲学的观念,然后依此进行研究。但是,他似乎不是这样认为的,他似乎还会认为,自己建立起来的是哲学的观念,自己是以中国哲学史的方式从事着哲学研究。冯友兰的个案表明,人们从西方哲学的概念出发,到头来重新定义了哲学的概念。比如,人们认为哲学是关于人类精神的反思,因而拓展了中国哲学的涵盖范围;又比如,人们认为中国哲学是“浓缩了中国文化精神,代表了中国人的思维方法,蕴藏了中国人的生活智慧的学问体系”^[4](P59)。在这样的研究中,人们不仅建立起中国哲学的理论体系,而且塑造了“中国哲学”这一概念,并由此再进一步去定义哲学,比如认为“哲学是人对自己所处环境的觉解和对自我的行动及其后果的有系统的反思”^[4](P63)。仔细观看和分析中国哲学的研究发展过程,可以发现一个清晰的变化,这就是一开始借西方哲学的观念来看待中国思想文化,寻找一些相似和相应的东西,到头来基于对中国哲学的认识来谈论哲学,并以此继续中国哲学的研究和发展。

但是,中国哲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哲学观念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对我国西方哲学研究产生了影响。比较典型的现象是,一些西方哲学研究者会结合中国哲学来谈论哲学,而在这时,他们也会推出与人相关的理念,比如,张世英晚年极力主张“天人合一”的哲学观。我并不在意这些人研究方向和方式的改变,我的意思是,他们对哲学的认识最终发生变化,而这是他们研究中国哲学以后所发生的,特别是哲学观念的变化。这里我想以张汝伦的一个论证为例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讨论。

张汝伦兼修中西方哲学,更是从西方哲学寻找资源,论证哲学是与人相关的研究。他引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哲学属于人的此在本身。它在这个此在本身中发生,并有其历史”,他由此出发进而说明:海德格尔认为“哲学首先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他称赞“海德格尔对哲学本质的这个界定,相当深刻,不同凡响”^[6](P45-46),他经过进一步的讨论最后就得出结论说:“如果哲学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那么只要是人,都会有哲学,都必然有哲学,即使‘哲学’这个名称产生于西方。”^[6](P48)

^① 关于冯友兰的哲学观和哲学史选材的问题,我曾作过详细讨论^[5]。

这样的推论是不是有道理乃是可以讨论的。就是说,从海德格尔的话是不是可以推出哲学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我认为不可以,即便可以,这一说明也是有问题的。首先,这里的说明与哲学相关,还使用了“本质”一词。众所周知,“本质”一词的基本意思是“是什么”,相当于关于什么的说明。但是,任何一种与哲学相关的说明,即使使用了“本质”一词,就会是关于哲学什么的说明吗?其次,引语中海德格尔所说的“哲学”,一如张汝伦所说,不是名词,而是动词或动名词philosophieren。该词显然应该译为“做哲学”或“进行哲学活动”。现在将它直接译为“哲学”并用来谈事,这样做对吗?第三,哲学与做哲学或进行哲学活动无疑都与哲学有关,但它们会是一回事吗?关于它们的说明难道会是一回事吗?第四,海德格尔称作哲学这样的事情属于人,动物不进行这样的活动,当然是可以的。问题是,能够把这样的说明看作关于哲学什么的说明吗?在我看来,以上问题是明显的,不必深究。人们不会不知道西方哲学有许多关于哲学什么的论述和探讨,张汝伦以这样一种方式引入这样一种论述来说明哲学是什么,显然别有用意。这个论证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其中的两个意思却非常明显:其一,他想得出一个结论:只要有人就会有哲学,哲学与人相关;其二,这是来自西方哲学名家的认识,似乎可以显示出其结论的充分有力。好像这样一来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谈论中国哲学了。我想问的是:这是西方哲学家们关于哲学的普遍看法吗?中国哲学需要这样的论证吗?这样的论证可以说明中国有哲学吗?

三、为“存在”辩护

中国哲学是中国的主流哲学,具有中国特色,不仅在国内具有影响力,其国际影响力也日益增长。中国哲学与中国的思想文化直接相关,涉及中国思想文化的过去、今天和未来。我认为,认识到中国的思想文化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并不难,但是,对我国哲学的研究而言,不仅应该认识到这一点,还应该认识到,中国的思想文化对我国西方哲学的研究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西方哲学研究涉及翻译问题,因而涉及西方语言转换为汉语的问题,一如前面所说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存在”“知性”等用语字面上具有一些特定含义,消除了外文本身的一些含义,它们会对思想的呈现带来一定的影响。其次,西方哲学研究涉及理解问题,而且这一问题是多层次的,不仅会影响到翻译及其结果,而且也会影响到对译著的理解和解释。此外,这样不同的理解还会在哲学讨论中体现出来,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影响到不同看法的形成、阐述和批评。下面以being问题为例来说明中国的思想文化对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影响。

众所周知,being一直被译为“存在”。近年来关于being的争论很多,简单说有两种观点。存在论认为,being有不同含义,应该依据不同语境将它翻译为“存在”“在”“是”“有”,等等;“一‘是’到底”论则认为,应该将being译为“是”,而不是译为“存在”,应该在系词的意义上理解being,并且应该将这样的理解贯穿始终。这两种观点泾渭分明,争论已有多数。这里仅从存在论者为“存在”辩护的一些观点出发,谈一谈中国的思想文化对哲学的影响。

一种观点认为,being是系词,若不译为“是”,本体论讨论就会走样,但中文没有办法将“是”变为名词,以“是”来“硬”翻译^[7](P495-496)或“强行翻译”^[8](P287)行不通。这样的认识显然是从中文以及对中文的认识和理解来说的。它是不是有道理姑且不论,结果却有严重问题:明明已经认识到不将being翻译为“是”,本体论的讨论就会走样,可依旧不译为“是”。也就是说,其态度是宁可错译,其结果就是提供了一种使本体论讨论走样的译本。

一种观点认为,翻译要符合汉语的母语习惯,而“存在”或“在”这样的翻译符合汉语习惯,比如,“狗在花园里”符合汉语语感,而“狗是在花园里”这句话就不符合汉语习惯。这种认识是不是有道理姑且不论,明显也是从中文角度说的,忽略了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这句话的德文是“Der Hund ist im Gar-

den”，与其他13个含ist的例子一起来说明Sein，即后者是一个词，随便一说就会被说出来^①。因此，这句德文中的“ist”是系词，只有“是”才是与它对应的，而“在花园里”的“在”与句中“im Garden”中的介词“im”是对应的，而与其中的系词“ist”不是对应的，因而起不到关于Sein的说明。

一种观点认为，“单字难以成词，现代汉语已经形成了以双音节词的语言习惯”，所以要采用“存在”这个译语^[111](P368 脚注)。这个观点显得比较牵强，因为它自己就使用了“字”和“词”。或者，它是不是有道理姑且不论，明显是从汉语表达习惯以及对这种表达习惯的认识和理解出发的。若是依据这种观点，being就只能译为“存在”，这样一来，它对“有”和“在”的翻译也应该批评。

一种观点认为，系词的理解有过于浓重的逻辑倾向，甚至有一种逻辑主义倾向，它会把关于being的哲学讨论变为纯粹的逻辑理解和分析，会把“存在”的含义割裂出去，会消除哲学的意义，因而是肤浅的^[121](P809-810, 1172)^[131](P329)^[141](P46-47)。这种观点显然涉及对逻辑的理解，与对逻辑在哲学研究中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相关。限于篇幅，我在这里仅指出，缺乏逻辑的理论和认识是我国思想文化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我们在研究中应该正视和重视这一问题，努力克服这一缺陷，提高对逻辑的认识，而不应该只是笼统地主张哲学怎样，从原则上批评逻辑怎样。应该看到，在西方哲学关于being的讨论中，始终是有逻辑的，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始终是相关的，是被使用的。

一种最为普遍的观点认为，既然being是个多义词，怎么可能“一‘是’到底”？怎么可能只用一个词来翻译它？对于这种观点我已经讨论过许多，不再重复^[10]。我想说明的是，这里涉及哲学中一个重要的认识，即要区别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东西。这是西方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产生的认识，并且，要将这种认识明确下来，使之成为一种方法论原则。这样的认识在中国哲学中是没有的，即使有相关论述，也不会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认识。我认为，说明这里的问题并不难^②。请考虑如下看法哪一个是正确的：

其一，“being”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系词含义，一种是存在含义。

其二，“是”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系词含义，一种是存在含义。

其三，“存在”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系词含义，一种是存在含义。

我赞成前两个看法，反对最后一个看法，因为“存在”一词没有系词含义。所以，我认为应该将being译为“是”，而不能译为“存在”。being是一个词，有它的含义，翻译being的那个词也是一个词，也要呈现being的含义。因此，将being翻译为一个词是一回事，认为这个词有什么含义则是另一回事。以“是”来翻译being，就是以一词的形式把它的两种含义呈现出来：讨论“是”，不仅可以讨论系词含义，也可以讨论存在含义；而以“存在”来翻译being，很明显字面上彻底消除了其最主要的系词含义。

以上观点足以表明，在关于being问题的讨论中，特别是在存在论者的辩护中，汉语语言和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些表现方式显示，同样是研究西方哲学，中国的哲学家们会有一些不同之处。特别是在being这样的重大问题上，他们越发显示出在理解方面的差异。说这是重大问题，主要是因为它涉及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与语言相关，与逻辑相关，与学科相关，与思想文化相关。在我看来，中国的哲学家与西方的哲学家有不同之处是正常的，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种不同，尤其是对这种不同要有正确的认识。

四、哲学的实质

以上论述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对我国哲学研究的影响，实际上说的是一种地域性的思想文化对哲学学科的影响。中国是这样，西方同样是这样。哲学是在西方思想文化中产生的，在其发展中也始终受到

① 这是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的举例说明。我曾作过详细讨论^[9](P176-178, 199-200)^[10](P298-302)。

② 许多人私下向我询问并质疑过“一‘是’到底”论的问题。有人说，在中国哲学中，一词多义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直观上似乎即可以认为，在being问题上，“一‘是’到底”是行不通的。他们明确地说没有时间读我那些大量细致的讨论，希望我可以以中国哲学的方式，三言两语地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其思想文化的影响。“哲学”一词的希腊文字面意思是“爱智慧”，意思极其宽泛。泰勒斯被称为第一位哲学家，他最出名的事迹就是眼望星空而跌入坑中和预测到橄榄丰收而提前囤积榨油机大发其财。这些故事与其说与哲学相关，不如说与天文学相关。基督教对哲学更是有长期而巨大的影响，上帝及其信仰被引入哲学，占据统治地位，“我相信所以我理解”这一具有神学背景的信念成为主流意识，迫使哲学的理论及其方式作出改变。维也纳学派深受科学的影响，明确提出“一切形而上学的命题都是没有意义的”，认为哲学是一种澄清命题和语言的活动。所有这些都对哲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但是，纵观西方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主线，这就是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分析哲学，可以简称为形而上学。也就是说，尽管西方的思想文化对哲学有重大影响，但是哲学自身一直在发展。比如，亚里士多德明确地说，有一门科学，它研究“是本身”，以此提出了哲学研究的一种方式，他的《形而上学》也形成并提供了最初的研究成果。他这种对哲学的认识，乃是一种学科意义上的认识，除了其研究本身外，还为哲学这个学科提供了理论认识。形而上学，或者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第一哲学，是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其他学科只研究“是”的一部分，而形而上学研究“是本身”。所以，我借用他的方式说，一门科学是关于一类事物的认识，而形而上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15]。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形而上学不仅与其他学科相区别，而且与许多被称为哲学的东西相区别。又比如，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是”这一著名论题，明确指出唯独我思考这一点不容怀疑，显示出极力摆脱宗教神学影响的倾向，而其论题依然落在“（我）是”上，因而与传统形而上学直接相关。再比如，康德尽管保留了关于上帝存在的讨论，却重新提出形而上学是不是科学、是不是可以成为科学的问题，他明确指出，我们的认识来自经验，但依然有一些认识与经验无关，由此重新开启了关于形而上学的研究。

聚焦形而上学，不仅可以看出being问题是其核心问题，同样可以看出西方思想文化方面在相关讨论中的影响。比如在当代讨论中，卡恩直接从《荷马史诗》出发，探讨einai一词在古希腊文献中的使用方式，由此说明其动词含义及其用法的形成和发展，以此说明该词在哲学中使用的意义^{[16][17]}（第二章），并对传统的系词(copula)和存在(existence)这种二分认识提出直接的挑战。海德格尔在关于being的讨论中也有大量关于古希腊文的探讨，特别是关于该词词根和来源演变的探讨^{[18][19]}，以此提出对being一词本身含义的追问。这种分析文学作品、探讨古希腊语言及其词源的方式，无不直接与西方的思想文化密切相关，因而显示出西方思想文化对形而上学的影响。所以，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对该国哲学研究产生影响，这是自然的事情；中国的思想文化对我国哲学的研究和发展产生影响，乃是自然的事情。关键在于，我们对这样的影响应该有清楚的认识，而且也应该有正确的认识。

我认为，思想文化对哲学的影响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思想文化，二是哲学。思想文化是一个民族与生俱来的东西，或者说，是随着一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而产生和带有的东西。但是，哲学不是。哲学有一种特殊的性质，就是它的学科性。古希腊哲学可以是许多科学的母体，可以与许多科学有密切联系。但是，自亚里士多德说出“有一门科学，它研究是本身”以来，哲学就具有了一种非常明确的性质，这种性质使它可以与其他学科和科学相区别。亚里士多德称它为第一哲学，后人称之为形而上学。它可以孕育在古希腊的思想文化中，但它终究还是破茧而出，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它可以继续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但它也始终在顽强地发展。康德以“批判”命名自己的哲学，除了《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之外，还有《纯粹理性批判》，它们无疑是不同的，但最受褒扬的还是后者。黑格尔以“哲学”命名自己各种各样的著作，包括《自然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等等，也有不以“哲学”命名的著作，包括《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但最受推崇的也是后者。这里的原因也许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因为它们形而上学著作，对哲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以上都是哲学史上的常识，但都显示出一个共同点：这些著作因循形而上学，也就是说，它们因循哲学的实质努力前进，竭尽全力致力于发展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在相关论述中常常使用“纯粹”“普遍”“绝对”这样一些概念，以此来修饰他们所说的哲学。这样的工作注定带有学科的意识，因而会有意

识而无意识地对非学科意义上的东西、对宽泛的思想文化意义上的东西进行剥离,努力使所谈之物成为学科和科学意义上的东西。

相比之下,中国的思想文化对我国哲学研究的影响要更为复杂一些。这是因为,哲学是从西方引进的,因此,在我国还多了一层对西方哲学的理解的问题。换句话说,中国人对哲学的认识受到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因而在我国,不仅中国哲学的研究受到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西方哲学的研究也受到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限于篇幅,下面还是以为“存在”辩护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在我看来,今天人们为“存在”辩护,实际上是在为一种业已形成的知识结构辩护。存在论者大多数都是从阅读西方著作起步的。但是,他们阅读的是译著,其中的being已经译为“存在”了。这是一种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翻译。他们由此建立起自己的知识结构,然后又依据这种知识结构从事研究,包括翻译和写作,结果使这种知识结构不断强化,在这种知识结构下不断催生自己的认识,使符合这种知识结构的认识不断复制,代代相传。“一‘是’到底”论则不同,它不仅是对“存在”的质疑和批评,实际上也是对这种知识结构提出质疑和批评。

“一‘是’到底”论与存在论这两种观点的对立是自然的。我认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在于是否认识到,将being译为“是”还是“存在”,绝不是简单的翻译问题,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比如,being是不是系词,汉语中“是”这个词是不是系词,二者是不是对应,至少在系词这一点上是不是对应,这是清楚的,也应该是清楚的。一些人总是回避这种对应性或者在这一点上闪烁其词,这显然是不对的。这是因为,西方哲学主要是在系词的意义上来探讨being的,使用“系词”这个术语时是这样,不使用它时也是这样。即便出现了“存在”(existence)一词,明确地讨论存在含义(sense of existence),being一词的用法和含义也不会改变,其系词含义和存在含义也可以在being的不同用法中表现出来。又比如,西方哲学与逻辑相结合。传统逻辑的基本句式是“S是P”,其中的“是”乃是核心概念,这与形而上学所说的“是本身”字面上就是相通的。许多人不懂逻辑也不重视逻辑,忽视甚至贬低逻辑,因而认识不到逻辑对哲学的重要性。这无疑是不对的。应该看到,逻辑为哲学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因而人们探讨主词和谓词、肯定和否定、命题和事实、真和假。而在传统逻辑中,所有这些都是围绕着“是”并基于“是”进行的,而且这样的讨论也会涉及存在问题,比如认为“有S是P”表达了存在,认为“所有S是P”预设了主项存在。所以,不是不可以认为应该以“存在”来翻译being,也不是不可以为这一作法辩护。问题是,要认识到这样的翻译和辩护是不是有道理。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讨论过许多,这里只是借助这个问题来说明,由于知识结构中“存在”这一概念根深蒂固,给我们正确理解西方哲学中的being问题带来问题。

五、形而上学与“加字哲学”

认识中国的思想文化对哲学研究的影响,区别形而上学和中国哲学,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哲学的性质,更好地发展我国的哲学研究。最简单地讲,我国哲学研究受到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形成目前的样态。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认识到,哲学本来是不加字的,因为引进到中国,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下,我们产生并形成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基于二者的区别可以看到,即使在西方哲学中,也存在着形而上学和其他哲学的区别。近年来,我提出了“加字哲学”的概念,这样就把哲学与“加字哲学”区别开来,也可以说把形而上学与“加字哲学”区别开来。形而上学是先验的,“加字哲学”是经验的。所以,中国哲学是一种经验性的研究。认识到这一点,至少可以有如下几个优点。

其一,更好地认识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它与逻辑相关,是一种先验的研究,具有独特性。在整个哲学史上,它贯彻始终,不同时期表现为本体论、认识论、分析哲学等不同形态^①。

^① 若是将现代欧陆哲学,特别是现象学纳入视野,其实也是一样。比如胡塞尔说的现象学指“所有科学的科学”,这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是本身”,与我说的“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大体上是一致的。

它运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因而随着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发生的变化而变化。比如,传统逻辑的核心句式是“S是P”,“是”乃是逻辑理论的核心概念,因而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也是“是”。而现代逻辑的基本句式是一种函数结构,表现为一种概念和对象之间的关系,因而消除了“是”的核心概念地位。但是,由于现代逻辑提供了成熟的语义学理论,凸显了“真”这一概念,并使“真”与意义相对应,与概念和对象相联系,致使“真”这个概念成为哲学讨论的核心概念。也就是说,从古至今,人们表达认识的基本方式没有变,始终是“是什么”,这既是提问的方式,也是回答的方式。与它相关,“是真的”则是最基本的断定,既可以作为隐含的断定暗含在表达之中,比如“雪是白的”,也可以作为明确的断定表达出来,比如“‘雪是白的’是真的”。所以,同样是借助逻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认识,研究方式却可以不同:基于“S是P”这样的句式可以进行研究,从“真”这一语义概念出发也可以进行研究,只是产生的结果不同,形成的哲学形态也不同。传统哲学中产生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康德的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区别,黑格尔的辩证法,等等,乃是自然的;分析哲学形成弗雷格关于涵义与意谓的区别的理论,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维特根斯坦的世界是事实的总和的理论,以及各种意义理论和真之理论,同样是自然的。虽然各个理论的名称不同,尽管它们可以归于不同的哲学形态,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它们都是形而上学研究:它们都是关于认识本身的研究,都是借助逻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的研究,都是先验性的研究。

其二,更好地认识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特点是假定了对“哲学”的认识,通过增加“中国”二字来确立所研究的东西,并将它称为哲学。“中国”二字体现了一种地域特征,因而与一种特定的思想文化联系起来。在“加字哲学”中,这种加字的用法是比较少的,更为普遍的一种用法是对象性的,即加字所体现的东西表现为一种思考的对象。比如,道德哲学的“道德”二字表明,它所表示的东西成为思考和研究的对象,类似的还有科学哲学、宗教哲学、文化哲学,等等。加字所体现出来的对象性特征表明了“加字哲学”的经验性。由此出发可以看出,无论是表示地域性还是流派性的“加字哲学”,同样也是经验性的。

从哲学史来看,形而上学与“加字哲学”是有明确区别的。比如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都是这样。他们既有形而上学研究,同时也有“加字哲学”研究。他们是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人们重视和研究他们的著作。假如有了“加字哲学”的意识,则很容易看出,在他们那里,形而上学与“加字哲学”的区别还是比较明确的,至少有人是有明确认识的,比如,亚里士多德称形而上学为第一哲学,他还明确地说伦理学附属于政治学。

认识到“加字哲学”的性质和特征,对“加字哲学”的研究是有好处的。康德关于道德的形而上学原理的研究,在我看来,是这方面的典范。也就是说,即使是研究道德和与道德相关的东西,也是要有准则的,康德选择的准则是形而上学,即要在第一原理、第一原因的意义上来探讨与道德相关的问题。今天的道德哲学已经又进一步划分为比如生命伦理、环境伦理、企业伦理,等等。这些研究都会涉及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因而经验性非常明显。它们是不是能够解决社会问题姑且不论,但至少会在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健全相应的社会制度方面提供一些有益的认识和帮助。所以,如何认识这样的研究对于该研究的定位无疑是重要的,也是有益的。就中国哲学而言,我们可以不必考虑西方哲学的模板,不必在意西方哲学的术语和观念,而将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一些我们认为有哲学意义的东西发掘出来,进行整理和提升,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哲学。但是,我们也应该考虑,是不是中国历史上所有人都是哲学家,是不是他们留下的所有文献都是哲学文献^①?即使我们有了—种哲学的观念,比如关于人类精神的反思,由此可以构成中国哲学研究的核心,是不是就能以此一般性地说明哲学的观念?中国哲学是一种关于中国思想文化中—部分独特东西的观念,即—种“加字哲学”的观念,还是一种普遍的哲学观念?

中国哲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研究。道德哲学、科学哲学等也是我国现有的哲学研究,与世界范

^① 比如冯友兰曾将哲学系和哲学所工作和培养的人“叫作理论工作者,或哲学工作者”,他还说“处处都有哲学”,“领导各部门的同志,都是哲学家”^[20](P285,284)。

围的同类研究同步。我们应该继续努力,不断提高研究水准,促进这些研究的不断发展。认识“加字哲学”的意义除了旨在促进和发展它们的研究之外,还在于提请人们认识到,在哲学上加字如今已经有越来越泛化的趋势,甚至出现了动物哲学、涉及哲学,就好像加字是哲学的一种功能。应该考虑的是,在“哲学”上加字以后,是不是就会产生一种新的哲学?给哲学加字有没有什么标准和依据?如果有,是什么?

其三,更好地认识逻辑与哲学的关系。人们常说,西方哲学的根本特征是逻辑分析。在我看来,所谓逻辑分析并不是经验性的概念分析和语言分析,而是应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分析。仔细阅读西方哲学著作可以发现,逻辑理论和方法的应用主要是在形而上学。在“加字哲学”也有应用,但多是锦上添花,比如,休谟关于“是”与“应当是”的区别,被认为是对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区别,具有重要意义;胡塞尔也讨论这一问题以及二者之间的转换,把这一区别说成是理论科学与规范科学的区别。在分析哲学中,人们则从内涵语境与外延语境的区分的角度再次讨论这一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似乎可以看作逻辑理论方法的应用和拓展。

正确地认识逻辑与哲学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哲学。以矛盾律为例。它被看作一条思维规律。亚里士多德说它是一切证明的出发点,康德说它在形式方面是认识的普遍的真的标准。黑格尔主张辩证法,认为说一事物是什么时就意味着该事物不是什么,因而“是”具有自身否定的特征,即所谓具有辩证法特征。但是,将矛盾律译为“一事物不能既存在又不存在”,就使矛盾律失去了逻辑的意义,也失去了其普遍性。将黑格尔逻辑学的出发概念译为“存在”(或“有”)和“无”,也就割裂了他的理论与逻辑的联系,因而失去了其基于逻辑理论讨论的意义,失去了其关于哲学基础讨论的普遍意义。所以,正确认识逻辑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

正确地认识逻辑与哲学的关系,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哲学不谈逻辑甚至不太重视逻辑,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不必有什么自责。谈论天人合一、内圣外王本来就不需要借助逻辑的理论和方法,一如今天人们谈论阿尔法狗和元宇宙。我的意思是说,整体而言,不借助逻辑的理论和方法似乎并不影响中国哲学的研究。但是我认为,假如可以借助逻辑的观念和理论方法,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和认识也一定会有好处的。这里可以借助我的一个阅读认识来说明这个问题。

金岳霖是我国著名哲学家,他把现代逻辑引入中国,运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对我国哲学研究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受到推崇。冯契是金岳霖的学生,继承金岳霖学术传统和思想,同时也对金岳霖的一些认识和方法提出批评^①。他认为,金岳霖缺乏辩证法的认识,只是从逻辑出发看问题,是有缺陷的,而他认为自己从辩证法出发看问题是正确的。冯契的认识无疑来自他自己的哲学认识,特别是他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也就是说,即使是金岳霖的学生,即使声称继承金岳霖的学术思想和传统,由于深受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也不一定会认识、强调并谈论逻辑的重要性。在我看来,不是不可以批评金岳霖关于逻辑的看法,但更应该看到,金岳霖的学术成就就依赖于逻辑的理论和方法,与他关于逻辑的看法是分不开的。假如能够充分认识这一点,假如还可以认识到金岳霖是如何借助逻辑的理论方法来取得那些成就,达到那样的高度,那么,对于学习、继承、发展和超越金岳霖的思想,对于继承和发展中国的思想文化,一定会是更为有益的。

其四,正确地认识哲学,更好地发展中国的哲学。人们认为,哲学难以定义,因而对哲学有各种不同

^① 比如在谈及关于逻辑原则和归纳原则的看法时,冯契认为金岳霖“无疑更多地考察了思维的形式逻辑基础,考虑了认识过程中静态的一面,而对思维的辩证逻辑基础以及认识的动态的一面有所忽略”。在论及金岳霖关于“道”的论述时,冯契批评金岳霖过分注重逻辑分析,他还认为进行哲学研究“仅凭逻辑分析是难以企及的”,所以在冯契看来,金岳霖《论道》的哲学体系总体上“并不是一个成功的体系”。在讲到金岳霖关于逻辑秩序的论述时,冯契批评金岳霖只承认形式逻辑的秩序,而忽略了辩证法,“所以出现了偏差”。不仅如此,冯契还明确地指出他与金岳霖的不同之处,这就是金岳霖“不讲辩证法的矛盾”,而冯契强调辩证法的矛盾,认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多地继承了中国传统”,“也就是说对‘矛盾’一词作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不同用法的区分”。这些论述是冯契对金岳霖的批评,也充分说明他们对逻辑和辩证法的认识不同^[21](P127)。

说法。在我看来,这主要是因为,哲学有形而上学和“加字哲学”两种不同类型,而“加字哲学”又是五花八门,因而看法会有不同。比如,分析哲学家说,哲学的根本任务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这里突出了逻辑,显然是从哲学研究的方式说的。这种与逻辑相关的说明,显示出指的是形而上学。罗素说,逻辑是哲学的本质,真正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划归为逻辑问题,这突出了逻辑的作用和意义,因而指的也是形而上学。康德把知识分为依赖于经验和独立于经验的,称后者为先验的,并借助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对后者进行研究,所以,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及其相关研究是形而上学。我说哲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哲学就是形而上学,主要也是基于哲学的先验性,基于哲学与逻辑的密切结合,依据的是从亚里士多德到分析哲学家们的相关认识。冯友兰说,哲学是关于人类精神的反思,主要是从中国哲学的角度说的,依据的是中国古代文献中的论述。人们说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观念形态上的指导作用的意义说的。所以,说法不同,依据也不同;或者说,依据不同,说法则不同。在我看来,形而上学与“加字哲学”之间最大的区别有两个,一是形而上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而“加字哲学”是与加字所表达的东西相关的,二是形而上学是哲学史主线上的,是贯彻始终的,而“加字哲学”不是。

哲学从西方被引入我国并获得了发展。中国的哲学发展受到中国的思想文化的影响,这是自然的,也是正常的。今天,我国哲学研究呈现出繁荣面貌,既有独具特色的中国哲学研究,也有专门的西方哲学研究,特别是我们引进和翻译了大量西方哲学著作。正确地认识中国的思想文化对哲学的影响,正确地认识形而上学和“加字哲学”的区别,有助于提高我们对哲学的认识,提高我们对哲学作为一个学科、作为一门科学、作为一个专业的认识。应该承认,相比中国哲学,或者说相比“加字哲学”,我国的形而上学的研究和发​​展落后不少。这里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于,我国思想文化中缺乏对于“是什么”这样问题的思考,因而缺乏对相关问题,比如“是真的”的问题的思考,因而缺乏形而上学的思考方式,缺乏应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对相关问题的认识。若使哲学真正获得健康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首先就是要正视这些问题,并且充分地认识形成它们的原因和解决它们的办法。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到处可见。由于只是一句话,它的解释空间很大。应该承认,“而”这一词表明对后一句的强调,因此,这里的重点在这后一句。所以,这里强调的是改变世界,这与马克思主义原理是一致的。应该看到,“而”一词还表明,后一句与前一句是并列的,没有推论关系,因而前后两句可以是独立的。前一句是关于哲学家的说明。假定马克思的这一说明是正确的,则可以看出,他说了两点,一点是解释世界,一点是不同的方式;也就是说,解释世界也是需要有一定方式的。形而上学的发展表明,哲学家们借助逻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使用传统逻辑,人们说世界是事物构成的;借助现代逻辑,人们说世界是事实构成的。这显然是对世界作出不同的解释,原因也在于他们使用的逻辑理论和方法不同,因而解释的方式不同。哲学史的事实表明,马克思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而就解释世界而言,多一种方式总比少一种方式要好。

在我看来,假如对“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可以作引申理解,一种哲学即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方式,我们似乎也可以认为,西方哲学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方式,中国哲学也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方式;同样,“加字哲学”是关于世界的解释,形而上学也是关于世界的解释。非常清楚的是,形而上学与“加字哲学”是不同的,它们关于世界的解释及其方式也是不同的。

参考文献

- [1]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上册. 北京:中华书局,1947.
- [2]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 涂又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 [3]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上.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4] 张学智. 哲学与中国哲学. 哲学研究,2021,(11).
- [5] 王路. 从冯友兰的哲学史观看中国哲学史研究. 哲学研究,2000,(8).
- [6] 张汝伦. 作为哲学问题的“哲学”. 哲学研究,2021,(11).

- [7] 马丁·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 陈嘉映、王庆节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 [8] 邓晓芒. Being的双重含义探源//宋继杰. 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上卷. 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2.
- [9] 王路. 读不懂的西方哲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10] 王路. “是”到底论.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 [11] G. S. 基尔克, J. E. 拉文, M. 斯科菲尔德.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原文精选的批评史. 聂敏里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 [12] 周迈. 论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存在(是)“on”//宋继杰. 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下卷. 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2.
- [13] 倪梁康. 胡塞尔与意识现象学——胡塞尔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纪念特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 [14] 聂敏里. 存在与实体——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Z卷研究(Z1-9).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 [15] 王路. 论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 2021, (5).
- [16] C. H. Kahn. *The Verb "be" in Ancient Greek*.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3.
- [17] 王路. “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 [18] 马丁·海德格尔. 形而上学导论. 熊伟、王庆节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 [19] M. Heidegger. *Einführung in die Metaphysik*.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Tübingen, 1958.
- [20] 冯友兰. 三松堂自序.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
- [21] 冯契文集. 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 1988.

On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On Philosophical Research

Wang Lu (Zheng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estern philosophy has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some refl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hilosophy, criticizing the use of Western philosophy concepts and methods and the adoption of their approache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advocating the independent and distinctive study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contrast, there has been less consideration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s, methods, and approaches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and subsequent influence on the study of western philosophy in China. This paper holds that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have exerte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tudy of Western philosophy in China, both in terms of the formation of terminology and the orientation of ideas. The study of philosophy in China encompasses Chinese philosophy and West philosophy, among other philosophical fields, and its development requires mutual learning, integration, and common progres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on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in China is not only of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but also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philosophy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in China.

Key words Chinese philosophy; philosophical research in China; comparative studi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metaphysics

-
- 作者简介 王 路, 郑州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河南 郑州 450001。
■ 责任编辑 涂文迁